



哑证

〔苏〕 玛哈姆·纳塞布林 著

哑

证

(记实中篇小说)

〔苏〕玛哈苏姆·纳赛布林 著

牛 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 北京

Магсум Насыбуллин
Немые свидетели
Казань
Тата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79

哑 证

〔苏〕玛哈苏姆·纳赛布林 著
牛 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国防科委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3印张 58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0册

书号: 10215·36 定价: 0.2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纪实中篇小说。书中通过审理一具被害女尸案件，展现了一位富有侦查经验的侦查员的破案活动。在一个幽静的山谷里发现了一具被害女尸，死者面部完全被砸毁，难以辨认，尸体装在麻袋里，作案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罪证。面对这种复杂的案情，如何下手？死者是谁？被害原因是什么？负责这一案件的侦查员，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既要排除凶手设置的栽赃陷害的圈套，又要同他的合作者区检察长草率从事的作风作斗争，经过周密、艰苦的调查，掌握了确凿的罪证，根据逻辑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进行严密的推理，终于查出了真正的凶手，防止了一起冤、假、错案。全书逻辑严谨，推理正确，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朴实，不落俗套。故事内容融及了苏联今天的社会现实。本书可供专业侦查工作者参考，大专院校俄语专业学生对照阅读之用。

代 序

在长期担任检察机关侦查员的工作中，我经常在农村俱乐部、学校、工厂企业中作有关司法工作的报告。有一次在报告时，我收到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您在报告中所举的案例，都很有教育意义。报告中谈到法律的人道主义，对犯罪分子应有的惩罚，以及侦查员的崇高而艰难的工作，都使人们受到教育，增长知识。您应当根据这些材料写一本书。”

我回答说，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花费时间的工作。第二天，我把这一字条拿给我的朋友和老师，我们区的检察长穆哈迈德欣看。出乎我的意料，他并没有说什么：一个侦查员应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应当干与自己无直接关系的事，等等。相反他支持写这个字条的人，赞成我写书。

“这个建议很好，”他仔细读完这个字条，对我说道。“我们有义务宣传法律知识，教育人们尊重法律。你是有丰富经验的。你就来写本书，让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有个直观的了解。专业工作者谈刑事案件侦查，更有说服力，一定能起到防止犯罪的作用。”

我答应考虑这一建议。但是，如果没有检察长的一再督促，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他同我一道从我办案的实际工作中选出几件案例，我就动笔写作。至于书写得究竟怎样，那只能由读者来评价了。

考虑到书中所写的一些情节中涉及被告亲属，不致使他

们再一次经受创伤，所以我对书中人物的姓名、地名都作了更改。

玛哈苏姆·纳赛布林

我接到加急电报的时候，正在和爱人一起吃早饭。我看完就交给了爱人。

“共和国检察院打来的。”

我爱人拿起电报，就念起来：

“侦查员伊帕拉吉莫夫·哈伊南。接电后立即前往丘尔帕区巴伊基米尔村……”她脸一沉，叹了口气，“又出事了。你怎么变成了区际侦查员了！”

我知道，她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故意装的，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对我这个亚克布梁斯基区的侦查员，有时被派到共和国其它区内完成重要的侦查任务，她是感到自豪的。将近一年之前，我曾外出侦查一起凶杀案，得到好评。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区际侦查员”。

我区的检察长穆哈迈德欣已知道我即将出差。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不很高兴。穆哈迈德欣喜欢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在身边。一旦本区有事，侦查员不在，检察长是要负责任的。

“可是人家又是怎么想啊？”他愁眉苦脸地问道，不等回答，就谈起正题。“巴伊基米尔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那里的侦查员住医院了。当地也没有医生，你把萨基尔吉亚诺夫医生也带上。命令就是命令，没有办法。那儿的检察长是拉乌夫·加里也维奇·沙塔洛夫。认识他吗？”

“见过面。”

“祝你成功……”

我上了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先去接萨基尔吉亚诺夫医生。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法医，年近半百，大家都很喜欢他。同他一道工作，我是非常高兴的。

早晨七点半，我们出发了。

“那里谁被杀死了？”

“不知道。”

“你说，海伊南，你干侦查员这一行，不感到后悔吗？”

“不，不后悔。”

“这工作可难啊，”医生说。

“你的工作也不容易啊。”

“我们当医生的比较容易。我们常说，病人是医生的伙伴。而你的‘主顾们’只是一心想着如何能骗你，跟你离乱，把你看作势不两立的仇敌。对吗？”

“医生有医生的难处，侦查员也有侦查员的难处。”我用这样一种外交辞令来答复他。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你……因为我听到有些侦查员诉苦，后悔选择了侦查员的职业。”

“而我可喜欢这种职业。”

“这就好……”他于是转换话题，谈起别的来了，“要在巴伊基米尔呆下去吗？”

“不。”

“这个村子很小，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想，你的事不会很多。”

“如果一切都一清二楚，”我在想，“也就不会派我来了。”

巴伊基米尔村座落在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村旁流过。村里只有一条街，房舍之间堆着厚厚的积雪，地面长着垂杨柳、白桦树。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而幽静的小村庄。

在村苏维埃机关的楼房里，丘尔帕区的检察长沙塔洛夫和几名民警局工作人员正等着我们。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和沙塔洛夫就认识了。他头发已白，身体发胖，是一位忙忙碌碌的人。我常在共和国检察院发的文件上看到他的名字。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曾表扬过他。他把我介绍给民警局工作人员，简单地说了说案情。

离村子半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山谷，那儿有一眼泉水。昨天一早，本地的一位妇女去挑水时，发现一群乌鸦在山谷里飞来飞去。她走进山谷，用扁担拨开积雪，看到一条人腿。这个情况马上报告给喀山，得到的指示是在我到来之前要保护现场。村里的居民都在家，没有人失踪。

“派出警戒没有？”我问道。

“是的，已派去了。还从丘尔帕区里带来了警犬。”

半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现场。经过仔细查找，发现一个用小细绳捆得很不结实的麻袋。麻袋里装着一具面部被砸得难以辨认的裸体女尸。

萨基尔吉亚诺夫医生仔细查看了尸体。

“头部被一种钝的铁器砸毁，”医生说，“面部很难辨

认。唯一的特征就是两颗假牙。麻袋是很普通的，小绳子也是常见的一般的小细绳。暂时就只是这一些。”

“凶杀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我问道。

“难说，等解剖后，才能确定。”

发现的尸体、麻袋等物，都拍了照，进行了必要的测量。我作了现场侦查记录。

“我们先把尸体送到区医院，然后再送到喀山，”医生说道。“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

“是啊，这种案子我还从未见过，”沙塔洛夫摇摇头说，“丢了命，还被塞入麻袋……”

就在这一会儿，他突然显得衰老了，脸也消瘦了许多。我很想鼓鼓他的情绪，但怎么才能使他振奋起来呢？时间紧迫，也顾不上了。

“能动员十名民兵来吗？”我问他，“还要带上木锨。”

“好，我们来组织……”

民兵来到现场之后，我向他们交待任务：

“我们要寻找凶杀的痕迹、物证。任何发现都是很重要的：血迹、烟头、火柴、凶器等等。”

我们也放出警犬，但没有得到任何收获。

黄昏时，我们把整个山谷都挖遍了，什么也没有找到。

3

我们又一次在村苏维埃开会，会上应当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很早以前，”我发言，“古罗马人就已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天来回答的七个问题：什么，谁，何时，何地，如何，用什么方法，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暂时能够回答的只是第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有人被杀。我们应当尽快地搞清楚死者的身份，她是谁。专家根据头骨能再现出死者的形象。我和萨基尔吉亚诺夫医生明天就去喀山。你们的任务是，查清最近区里是否有人失踪，是否有人外出，到哪里去了，应当立即发函去查证。另外，是否有人来到这里，走亲戚还是出差。工作量是很大的，而时间又很紧迫。”

“这些我们一定调查清楚。”沙塔洛夫保证说。

分工明确之后，就散会了。这一夜我总是不能入睡。现在提出设想，还为时过早，但我总是想要弄清楚点什么问题，那怕能抓住一点小小的线索也是好的。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图财害命？情杀？强奸杀人？为什么凶手要把死者的面部毁坏？死者的衣服哪里去了？可能在山谷里就有我们发现不了的“哑证”。凶手当然是逃不脱惩罚的，但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揭露出来？可能几个月，几年。这是完全可能的，也可能不是我，而是另一位侦查员，也会弄个水落石出的。说真的，至今我所经办的几起严重的罪案，都是自己一手侦破的。难道这一次罪犯会从我手下滑过去，逍遥法外不成？不，我一定要抓到他。我不知何时，用什么办法，但我一定要把凶手捉拿归案。

凶手作案的行为，使我感到费解。他用一件铁器，连击几下，才把人打死。根据情况判断，他的目的是不让人认出死者，所以又从尸体上脱去衣服。……但为什么他不把尸体埋在雪里，这不更简单一些吗。看来作案现场不是山谷，很

可能作案是在这个村子里，某个家里。作案后，妥善处理尸体是很自然的事，但为什么还留下麻袋？会不会是有人惊动了，凶手惊慌失措？这要找上百个人来调查，总会有人看到过一点迹象。

这一惨案也可能不是在村子里发生的，而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他是步行来到山谷的。如果是用汽车运尸体，那只能运到附近某一个地方，而不能直接运送到这不通公路的山谷。凶手可能是两个人？这种可能性不大。

这女人是不是来这里探亲访友。她的到来，不会没有人看见。也不一定，她也许是深更半夜，搭顺路汽车来的。这一切眼下都很棘手，很不清楚。应当等解剖和化验的结果，就能确定她是谁。这是最主要的。

该睡觉了。但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思想总是把睡意驱散。似乎，仅在这现有的材料基础上我就应当作出某种结论似的。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某个细节上……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我的思路，在记忆中，追回我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但在已疲劳的大脑中，思想总不能理出头绪来，思路都已紊乱了。以前也常有这种情况，但有时我所需要的思想，在过一段时间后，还能象闪电一样地闪出光辉。当然不总是如此。有时，闪出的思想会消失，一去不复返。我是不是会放过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呢？这也完全可能。等到明天早晨头脑清醒一点，在不感到紧张的时刻，思想自然就会回来的。

我下决心不再去考虑这些烦人的惨案的各种细节。开始想起大学时代的生活，也想起了和爱人玛尔芙加初次约会的情景……最后，终于睡着了。

早晨六时起床。昨晚被驱散的思想没有再出现。为了自

我安慰，我把这看作小事一段，认为不必去注意。我住在村苏维埃主席家里。女主人已准备好早餐。很快车就来了。走出门就看到篱笆上的乌鸦在那里磨嘴。昨晚的思想又回到自己的大脑中……

凶手认为尸体只有到春天，才能被人发现。如果不是乌鸦，也可能就会如此。这一发现对侦查员是很重要的。凶手可能已知道，尸体被人发现了，开始紧张起来，担心暴露自己。但问题不仅在于此。调查开始得越早越好：这是发现凶手作案遗迹，查找人证、物证，减少化验工作的大好时机。凶手的运气不佳，——他所预料不到的时刻临近了，可能再有几个月就是严惩他的时刻。

4

最后的化验结果还没有写好。可我等不及了。我就请化验员先和我谈谈。第一个问题是作案时间。

“估计在十天以前，”他回答道。

这么说，就是星期六，二月一日。

“凶器？”

“死者是被一种铁器击毙的，用力很猛。很可能是一把生了锈的斧头。从化验结果来看死者头上围着灰色的毛头巾。年龄是19—20岁。穿的鞋是36号。民族：鞑靼，楚瓦什或者是马里族。”

“她是否被强奸？”

“没有。”

“没有怀孕？”

“没有。右大腿上有一片不大的胎记。头骨被严重砸毁。我们试试把死者的面孔恢复一下，两天之后您可以来取照片。”

当天，我就赶回巴伊基米尔，把化验报告交给了沙塔洛夫。他也给我讲了些情况。区里来了两名出差的女同志，她们安然无恙。外调的人尚未回来。又一次给附近居民点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年轻妇女失踪，回答都说没有。没有电话的地方，也派人去了，还在调查。

我决定亲自挨家挨户走访巴伊基米尔的居民。指望能有一线希望：有没有谁看见过一个扛麻袋的人。此外，我也想进一步熟悉一下巴伊基米尔的居民。

来到了第一家。好客的女主人，四十岁左右，对我说：

“我们村里，没有坏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有人把谁给杀了。”

在另外几家，对我也是这样说。在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谁也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现象和可疑的人。我收集了有关在区中心丘尔帕市工作和居住的巴伊基米尔村人的情况。这个村有二十人左右在丘尔帕市工作和居住。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材料是否有用。作为一个侦查员，他经常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的行为在旁观者看来是很奇怪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干的就是这种工作。而实际上，他的每一步都是几经反复，周密考虑好的。

死者的照片终于拿到手了。照片上出现的是一副伤痕累累，僵死呆板的面孔。化验员、医生的劳动总是使我为之惊叹不已，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迹。他们总和使人痛心的事件打

交道，工作是艰难的，但又是必需的。

巴伊基米尔及附近居民点，谁也不认识这个女人。沙塔洛夫有点灰心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难过地说，“而我们是止步不前。凶手正在销赃匿迹，下一步又该怎么办？”

“我去丘尔帕调查。”

“凶手一定是从别的区来的，把尸体扔在这儿就溜了。而我们还老在这里兜圈子。”

“也可能是这样……”

看来沙塔洛夫是不相信我能抓到杀人犯。

在丘尔帕市，我开始走访来自巴伊基米尔的姑娘们。有一位乳制品厂的女工，今年十八岁，仔细端详照片后，不肯定地说：

“有一次我看见过她。当然只不过是在我眼前一晃。”

“在哪儿？什么时候？”我竭力制止住内心的激动，但还是控制不住。

“在电影院的休息厅。我想就是她。这是在去年夏天。据说，她是一个裁缝。”

“姓名，您还记得吧？”

“不，我根本不认识她。”

“那么，谁告诉您说她是裁缝？”

“是我偶然听姑娘们聊天时说的。对啦！其中有一个姑娘曾谈到服装厂。”

“难道成功了吗？”我脑中闪出了这一念头。姑娘紧张地看着我。

“我可说不准，只不过是很像。您的这张照片又是这样”

可怕。”

这时我真想从这位陌生姑娘的口中得到更多的详细情况。完全有这样的可能：看来，只不过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细节，就会使整个案情走上正轨。我又问她：

“当时您是否留心，她是不是镶着假牙？”

“怎么可能注意那些，她只不过是从我身边走过。看上去她很忧郁，但很稳重……不，也可能我看错了。”

“不管怎样，我谢谢您啦！您记得，这姑娘有多高？胖，还是瘦？”

她想了想。

“个子和我不差不多，可能比我稍矮点儿，不胖也不瘦。身段很美。这难道是她？可怜的姑娘。我听说这个凶杀案了。”

“谁告诉您的？”

她说的这一个巴伊基米尔姑娘的名字，在我的名单中也有。我立刻赶到服装厂。

人事科长看完照片后，脸色苍白，惊恐地盯着我。说道：

“这……这……这难道是扎里玛·安拉亚洛娃？有点像。她，又不像。”

“请您把她的档案拿给我看看，”我请求他。

“好……好……就拿来……”

我把两张照片一比较。就是她！一张是活泼、充满生气的面孔，而另一张则是僵死呆板的的面孔。都是扎里玛·安拉亚洛娃。她生于丘尔帕区柯特勒——雅尔村。上完八年级后又在中技校毕业，然后就进了服装厂工作。住在厂里集体宿

舍。有几件对她的表扬信。我了解到，她从2月3日请假，准备去塔什干找哥哥去。

我同扎里玛同宿舍的两位姑娘在谈话。一个叫阿克里玛，另一个叫加蒂法。她俩争先恐后地告诉了我不少有关扎里玛的情况。原来曾有两个小伙子向扎里玛求爱，她同他们认识已有七八个月了。后来大概是吹了。扎里玛打算先回柯特勒——雅尔村看妈妈，然后再去塔什干。她曾对她俩说过，她计划到塔什干后就不再回来了。哥哥早就要她去。姑娘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二月一日的早上。

我的笔记本中又记了不少认识扎里玛的人的名字。其中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人都是巴伊基米尔村人。他俩的名字早列入了我的名单。一个是工业联合企业的木工阿赫迈特·达伏连兴，另一个是建筑工程队的施工员加塔乌拉·瓦利托夫。当天晚上，我就见到了这两个人。他俩都已经知道了这一凶杀案。说是家里来信说的。达伏连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找扎里玛了。瓦利托夫也有十天左右未见到扎里玛。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俩之中，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查找的人。

5

我竭力在想象事情发展的经过……在一次舞会上，扎里玛认识了阿赫迈特·达伏连兴。第二天，他就到宿舍来找扎里玛，请她去看电影。他来时刚刚喝过酒，还带着几分醉意。姑娘们就把他挡在门外，不让他进屋。以后他又来过几次，